



UN
CHRONICLE

联合国纪事

联合国在一个联合的世界上
第41卷 第4期 2004年12月—2005年2月



一个人人都能
参与的世界

UN
CHRONICLE

联合国纪事

联合国在一个联合的世界上
第41卷 第4期 2004年12月—2005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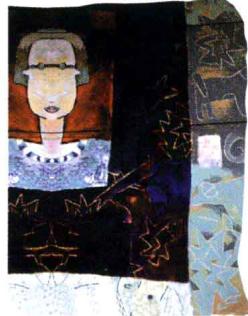


一个人人都能
参与的世界

本期内容…… 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

4 学会容忍

- 4 来自秘书长
同伊斯兰恐惧症做斗争主要靠教育
- 30 学会容忍系列研讨会
面对伊斯兰恐惧症
- 32 欧洲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现象
遏制这种上升的潮流
格林·福德
- 34 争鸣
新反犹太主义
从涂在历史墙上的文字说起
莫蒂默·B·朱克曼
- 35 反对反犹太主义的穆斯林
发扬共同价值观
塔利克·拉马丹
- 38 妇女、民主与伊斯兰教
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人权问题的看法
阮唐里惠·夸克·本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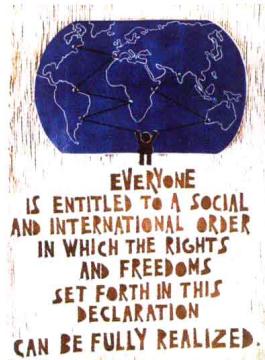
8 和平努力

- 8 同联合国和平大使的谈话
穆罕默德·阿里、安娜·卡塔尔迪和珍妮·戈德尔回忆他们为联合国从事的工作
- 58 肯尼亚单身斗士获诺贝尔和平奖
拉斯纳·沃拉
- 66 缅怀以身殉职的加拿大维和人员
艾伯特·沃尔森
- 68 联合国驻危地马拉核查团的过渡进程
确保危地马拉在和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汤姆·凯尼格斯、马斯·默斯基
- 70 联合国的广播与维和使命
架起了一座从战争通向和平的桥梁
朱莉安娜·里比罗
- 79 掠影
巨大的和平鸽



捍卫法律

- 6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辩论
纳米利塔·塔瓦尔
- 16 《联合国纪事》随笔
主权负有保护人权的责任
瓦塞林·波波夫斯基
- 19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终结豁免权和建立持久和平的工具
帕瓦尼·瑞迪
- 22 《联合国纪事》专访
大赦国际总干事伊琳娜·祖拜达·汗谈当代侵犯人权行为的复杂本质
- 25 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设民主
爱德华·纽曼、罗兰·瑞什
- 27 在保护人权的同时打击恐怖主义
莱斯利·帕尔蒂
- 29 死刑：世界站在哪一方
布里·波尔克-鲍曼
- 63 卢旺达：10年之后
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幸存者前途未卜
比特里兹·帕万
- 77 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
高级别小组提出了集体安全的新构想
霍斯特·鲁奇



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

10

- 10 “一切与我们相关的事情，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都毫无意义”
承认残疾人的权益
- 12 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
为争取残疾人的权益而奋斗
维克多·潘达
- 14 参与权和获胜权
国际残疾人奥运会
艾米·法卡斯

- 45 全球化时代的联合国
适应日益广泛扩散的威胁
阿克马拉尔·阿里斯坦比科瓦
- 46 全球化与发展
实现较公平的世界经济参与权
朱莉安娜·里贝罗
- 48 关于全球化的争论
介绍挪威《关于千年发展目标之八的报告》
希尔德·F·约翰逊
- 50 访谈……
沛丰金融公司总裁雅克·阿塔利接受《联合国纪事》采访，谈微观金融在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 51 人才流动
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安妮—克里斯廷·罗伊森
- 53 学习千年发展目标
大学教育的一种资源
埃莱克斯·奥提诺
- 59 为认识未来世界而学习
童子军活动与环境教育
艾多阿杜·米索尼
- 76 健康观察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

观 点

- 40 跨页插图
巴姆古城地震
乔瓦尼·坎皮
- 42 透过物质看精神
亚洲协会的印度传统艺术
瓦尔·卡斯托诺芙
- 44 “联合国作用重大，但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与孟加拉国记者的一次谈话
哈桑·费尔多斯
- 54 《联合国纪事》图书馆书架
《好商品？一项秘密原则引导着我们购物》
评论：阿里·科凯巴斯和霍斯特·鲁奇
《世界城市状况，2004/2005—全球化与城市文化》
评论：汤姆·奥桑乔和拉斯纳·瓦拉赫
《全球议程，摆在2004—2005年59届联大之前的问题》
评论：乔瓦尼·坎皮
- 61 通过影片进行教育
显示联合国的重要性
琼·克拉斯诺
- 72 联合国常驻使团与迪保罗大学的合作
帕特里西亚·斯茨尔巴
- 74 为农业新纪元而共同努力
桑德斯伯爵夫人

UN
CHRONICLE

联合国纪事

本期《联合国纪事》封面聚焦于积极全面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残疾人。正如残疾人活动家、获奖电影独立制片人维克多·潘达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有6亿人有着这样那样的残疾。“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是一个新的社会变革媒体项目，其目标是超越身体障碍，将残疾问题看成全球性的人权问题（第12页）。在本期中，艾米·法尔卡斯向我们讲述了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体育和娱乐方面促进残疾人进行“参与”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第14页）。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对联合国正在起草的旨在促进残疾人权益和他们所应该享受的尊严的公约方面起到了支持作用。

本期还刊载了一些供大家进行思考的文章，尊重并理解我们之间所存在的共同之处和分歧。2004年12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面对伊斯兰恐惧症：学会理解和容忍”研讨会。这一由联合国公共信息部教育外联处组织的研讨会是该部门开展的“忘却不容忍”研讨会系列的一部分。安南指出：“同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任何形式斗争的策略都必须主要依靠教育——不仅仅对伊斯兰教，对任何宗教、任何传统都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看清那些谎言和神话。”（第4页）研讨会的报告包括超越任何特定宗教或社会含义的辩论（第30页）。格林·福特在谈到“小报的恐外大餐”时指出，欧盟目前正在努力遏制极右势力的重新出现（第32页）。莫蒂默·B·朱克曼在其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文章中指出，“从势头上看，今天的反犹合唱甚至超过当年纳粹德国的鼎盛时期”（第34页），而塔里克·拉马丹则在其文章中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渊远流长的联系”进行了介绍，强调穆斯林和所有人应当对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予以谴责（第35页）。

本期还刊载了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所撰写的报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这一报告向人们展示了集体安全的全面前景（第77页）。该报告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全球化进程已经使世界面临“相互交织的共同的威胁，同时又拥有相同弱点的境地。”用阿克马拉·阿利斯坦贝科瓦的话说，“只有对联合国的庞大机构更新，包括建立一个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构”，才能使联合国重新焕发活力（第45页），这一问题在本期千年发展目标部分得到更加详尽的阐述（第46页）。

在本期《联合国纪事》随笔文章中，瓦塞林·波波夫斯基对主权应包括“保护人权的责任”这一现代观念表示支持（第16页）。另一篇文章则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为终结豁免权（第19页）机构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联合国纪事》专访中，伊琳纳·汗对全球人权机制及这些机制如何能够得到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20页），而爱德华·纽曼和罗兰·瑞斯则对联合国如何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建立民主基金问题进行了探讨（第25页）。同往常一样，本期《联合国纪事》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进行了评价，内容包括加拿大为维和行动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第66页）和联合国在危地马拉的维和行动所取得的进展（第68页），及联合国在卢旺达所蒙受的失败的教训（第63页）。

同伊斯兰恐惧症做斗争主要靠学会容忍



(左起) 乔治·华盛顿大学伊斯兰学研究教授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和联合国负责新闻及公共信息的副秘书长沙希·塔罗尔在联合国“面对伊斯兰恐惧症”研讨会上。

一个新的词汇在语言中出现，通常是科学进步的结果或流行的转移所致。然而，当世界不得不杜撰一个新的词汇来描述越来越广泛流行的偏执现象时，这种发展则令人感到沮丧和不安。“伊斯兰恐惧症”这一词汇的出现就是如此。

伊斯兰恐惧症一词似乎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出现的，但这种现象却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现在，历史的影响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全世界许多穆斯林感到悲伤和被人误解，他们担心自己的权利被剥夺，甚至自己人身的安全。所以，许多东西需要忘却。

在许多人头脑中所形成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许多媒体所持有的偏见都应当被遗忘。

人们通常将伊斯兰教看成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它同任何其他宗教一样，也存在着多种派别，分别由那些改革派或传统派的追随者们所管理。在有些评论者看来，伊斯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阿拉伯世界，但实际上大多数穆斯林并非是阿拉伯人。世界上拥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不在地处亚洲的阿拉伯地区——而是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伊朗及地处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也有许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世界各大洲的许多国家，众多穆斯林构成当地社会人口庞大的少数民族。

安南秘书长是在 2004 年 12 月 7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面对伊斯兰恐惧症，学会理解和容忍”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这一讲话的。这是联合国公共信息部组织的“学会容忍”系列讲座的第二部分（见第 30 页）。这一系列的第一部分“面对反犹主义”于 2004 年 6 月 21 日举行。

在许多时候，伊斯兰教义的宗旨通常被人曲解甚至断章取义，更有人将一些人的个别行为看成是这一丰富且复杂的宗教信仰的象征。有人认为伊斯兰和民主不相容，伊斯兰和现代性以及妇女的权利相悖。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对穆斯林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未经过任何调查就被允许四处传播，结果使得这些偏见被一些人不加分辨地接受。

在历史上，尽管穆斯林同其他民族之间出现过对抗，可同时还出现过通商与合作，并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相互影响，互相丰富。然而，根深蒂固的偏见将穆斯林描绘成是同西方对抗的。实际上，如果那些基督教的学者们在中世纪及以后的岁月中没有从伊斯兰文学中得到许多借鉴，学到许多东西，那欧洲的文明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发展。

此外，我们还必须忘却那种恐外的习惯。由于害怕“他人”现象的蔓延和盛行，我们有时甚至会认为这是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无法改变的天性。但人们并非天生就有偏见，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的仇恨是被教唆出来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的仇恨是受其领导人操纵的，这些人利用人们害怕、无知

或自卑的心理来操纵仇恨。

同那些拥有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存在着压力，尤其在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今世界。在欧洲，由于过去几十年里大批移民的突然涌入，情况更是如此。但这些不应该成为视外来者为妖魔、或利用人们的恐外心理来达到政治目的的理由。这样做只能加深人们之间的猜忌，使他们更加疏远。

从某种程度上讲，学会容忍事关法律保护问题。《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保护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了人们的宗教自由及不因宗教信仰而遭受歧视的权利。这些准则已经被许多国家写入宪法。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目前仍在继续对这一权利的行使及受到侵犯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对同伊斯兰恐惧症和其他形式的种族歧视及不容忍现象作斗争的方式予以指导。

但法律和准则只是一个出发点。

同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斗争的任何策略都必须依靠教育——不仅伊斯兰，包括所有的宗教和传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看清谎言和神话的本质。

我们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防止媒体和网络被用来传播仇恨。

领导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公共权力部门不仅应该谴责伊斯兰恐惧症，还应保证执法部门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切实执行非歧视政策。

在许多拥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大规模穆斯林社区的出现相对来讲是一种新现象。种族融合是一条双向路，移民们应当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社会也应当进行自我调整。东道主和移民同样都需要理解对方的期望和责任。必要时，他们还应当能够行动起来，共同面对诸如极端主义等威胁。

不同信仰之间进行对话是十分有益的。但问题的出现往往不是因为宗教的共同之处所造成的，这些共同点往往在这种对话中得到赞许。问题往往是因为其他的相似之处引起的，即人类往往不惜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偏袒自己的团体、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文化这一倾向。这种信仰之间的活动还可以采取一种更加实际的方向，可以以这些社区为例，通过职业

协会、体育运动或其他社会形式，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经常相聚。这种日常接触的好处是不带为对话而对话的人工痕迹，特别有助于使“对方”感到不再神秘化。

要诚实看待伊斯兰恐惧症还必须看到它的政策背景。历史上，穆斯林经历过殖民主义及西方的统治，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怨恨更因为中东地区的冲突、车臣局势以及前南斯拉夫针对穆斯林的暴行而加剧。这些事件容易让穆斯林本能地产生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但我们应当记住，这些其实是政治反应，也就是说是对一些具体政策的不认同。但穆斯林的这些感受往往被认为是针对西方价值观的伊斯兰反应，这就容易引起反伊斯兰的想法和举动。

要和伊斯兰恐惧症作斗争，就必须和打着伊斯兰名义的恐怖主义及暴力活动作斗争。不应以极端主义分子蓄意杀害平民的行为来评判伊斯兰。因少数人的恶行而让所有的人背黑锅是不公平的。大家都应该谴责这些人的恶行，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为他们杀害无辜的恶行洗脱罪名。穆斯林

自己更应该站出来表明态度，孤立那些实施暴力、歪曲伊斯兰的人。在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事件发生后，许多穆斯林就是这样做的。或许，只有从伊斯兰内部通过自由诠释的穆斯林伊智提哈德传统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这种公开的质询，这种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他文化中是与非问题的坦诚态度，为解决这一问题及其他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伊斯兰恐惧症不仅对穆斯林来讲是个深刻的个人问题，对于任何相关者来讲也事关坚持国际价值观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和谐。伊斯兰是世界伟大宗教、伟大文化和伟大文明之一，其成员感受到歧视和仇恨的现象应该被重视。我们应将在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们之间重建信任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否则，歧视现象将继续给许多无辜的生命蒙上阴影，人们之间将不再相互信任，这有可能使我们有关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宏伟国际议程无法得到实现。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之间应该相互理解和尊重，和睦相处，实现各自传统中的最美好的东西。做到这一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许多。但正因如此，才值得我们竭尽全力更加努力地去尝试。□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 59 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辩论

纳米利塔·塔瓦尔

第 59 届联合国大会响应本届大会主席、加蓬外长让·平的建议，对目前全球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开始进行年度高级辩论，这些亟待采取有效行动的问题包括战争、恐怖主义以及贫困和疾病问题。每年，联合国大会都在一般性辩论中为成员国就广泛关心的问题和国际问题提供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听取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的发言。在今年的大会上，联合国的 191 个成员国中有 190 个成员及两个观察员发了言。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大会一般性高级辩论开始时的讲话中发出警告说，国际法正被“无耻地漠视”，他敦促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动用他们的权力，采取一切措施，使法律在国内和国际上得到尊重。大会还分发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报告，这一报告对联合国系统去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重点强

调了联合国正在扩大的工作范围。报告的内容包括联合国在实现和平与安全、履行其人道主义责任、为发展而合作、人权、国际法律秩序、加强管理与伙伴关系等领域所进行的活动。报告承认，在过去一年中联合国面临着“特殊的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对与会的各国代表团说，“法律在世界各

地正面临着危机”，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采取措施，以恢复对法律基本原则的尊重。安南表示，在当今世界，暴力和灾难正在动摇着许多国家，“那些在国内实行法治的国家在国际上也应该尊重法律，每个在国际上坚持法治的国家，在国内也应该加强法治。”

64位国家总统、25位政府总理、86位外长出席了2004年的联合国大会，加强法制、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反恐和在发展及和平与安全方面加强国际社会间的合作与协调等问题是本届大会讨论的重点。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府首脑再次重申了他们的承诺，一致同意支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更加有效地应对新的挑战。

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安理会进行改革，特别是安理会中应该有非洲和亚洲的常任代表席位。她表示：“我们注意到，人口最多的亚洲地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这一地区目前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数量远远不够。”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发言中强调，他的国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是安理会的权力范围。“日本所发挥的作用为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已经到了对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芬兰总统哈洛宁表示，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扩大其成员国代表席位的时间已经成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今的世界。“我们还应该使联合国大会重新焕发活力，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使经社理事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德·席尔瓦认为，安理会是惟一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采取行动的合法机构。他还认为：“这一机构在结构上应该更加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而不应只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的永久性延续。目前的那些改革建议力度明显不够，它只是给现在的结构换上一件新衣，并不包括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等实质性内容。”

代表们还就结束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发出呼吁，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对由美国、俄罗斯联邦、欧盟和联合国四方提出的“路线图”方案表示支持。

奥地利联邦外长本尼塔·费雷罗－瓦德纳在发言中强调，只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有效多边机制才能使国际社会应对目前所面临的新型复杂的挑战。她还说：“路线图计划是公正、全面并持久解决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使两国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下共同生存的惟一途径。”

许多成员国的代表在发言中还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及制定与实现这些目标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方面进展缓慢表示忧虑。冈比亚总统贾梅在发言中强调，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在农业补贴方面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规定，但还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一步开放市场，并放开农产品贸易。

越南第一副外长黎公凤在发言中表示，发达国家应该更加严肃地履行它们所做出的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市场的人径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更加公平和有利的条件。”

爱尔兰外长布里安·考恩表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能够使世界较为贫困的国家解除贫困。“一个旨在促进投资的开放的贸易体制是我们这个多边系统整体的一部分，而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则是这一体制的核心。”从最好的方面看，考恩先生认为，多哈回合所取得的成果能够使得5亿人脱离极度贫困。

印度总理辛格在其首次联大发言中，呼吁在为处于全球化边缘的人们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援助方面寻找更有创意的资助来源和渠道。他说：“如同关起门来不能使繁荣得以持续那样，将贫困边缘化也并不能使这种现象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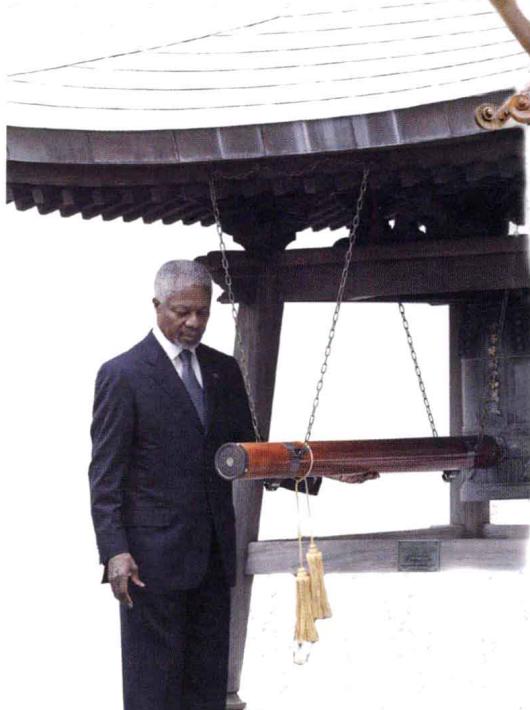
巴哈马外交及公共事务部长米切尔在发言中表示，今年以来，飓风查理、弗朗西斯、伊万和珍妮给加勒比海岛屿和美国的部分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人因飓风造成的灾难而无家可归、缺少食物、水和电力供应。这些灾难对家庭、基础设施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及商业造成的损失迫使我们强调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灾难后重建和恢复的重要性。科学证据显示，“我们所遭受的这些飓风灾难同气候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十分明显，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抵御这些灾难、保护我们自己的”，他认为，那些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国家应当改变他们的态度。

在一般性辩论中，恐怖问题最为人们所关注。马尔代夫外长法祖拉·贾米尔在发言中表示：“我们这样的小国更难以面对恐怖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因为我们的安全完全取决于全球性的安全和所有国家对法律的遵守。”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发言中认为，国际法显然不是不能更改的教条。“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国际法。”

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道斯在发言中表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受到恐怖主义的困扰。”他在谴责恐怖分子对别斯兰和澳大利亚大使馆的袭击是懦夫行为的同时，强调国际社会不应允许这种威胁安全的现象蔓延。“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思路、实际行动和政府间的合作。很明显，联合国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和平大使会议 对他们工作的影响



作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在和平钟落成50周年之际你本人有什么感想？

卡塔尔迪女士：我感到有些啼笑皆非，因为今天正是联合国大会开幕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和平纪念日里，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却是战争。从这方面看，和平钟声的敲响在我脑海里所展现的是希望。

戈德尔女士：对我来说，钟声的响起象征着世界上大多数普通民众对和平的向往。今天，世界因许多冲突正处于危险的时刻，钟声响起时使人感到有些颤栗。今天，我们这一机构在世界上70多个国家将组织青年放飞那些模拟的和平纸鸽，估计将有几千只。我们这样做是使人们在心中保持希望——那种对未来的希望——和平的钟声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它的理解。

你们如何看待和平教育在转变人们对和平文化的看法上所发挥的传播作用？

戈德尔女士：9·11事件发生后，我们将一群来自完全不



9月21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以敲响和平钟的方式来纪念每年一度的国际和平日。这座和平钟是用60多个国家的儿童收集的硬币铸造的，于1954年由联合国日本协会赠送给联合国。联合国和平大使穆罕默德·阿里（上图左起）——在其夫人尤兰达的陪伴下——珍尼·戈德尔和安娜·卡塔尔迪等人参加了和平钟落成50周年的纪念活动。仪式之后，《联合国纪事》的丽莎·克鲁基和霍斯特·鲁奇就他们对和平的期望、对世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容忍和理解精神采访了这些和平大使。

同背景的青年——包括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召集在一起，发起一项“和平创造”活动。现在这一活动已经扩展到我们在全世界的组织中。在这一活动中，我们尽力帮助孩子们加深对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种族的人们的理解，特别是在宗教方面，因为宗教方面的分歧最容易产生不和。

卡塔尔迪女士：我记得在苏丹南部的一个难民营中曾进行过一个和平宣传计划。这一计划在当时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因为在那你能同那些有着切身的战争感受的人们接触。这一项目、那些妇女及人民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在那里只参加了三天关于妇女和法律的会议，但这一经历促使我对联合国进行思考。以达尔富尔地区正在发生的危机为例，联合国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态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作为一个机构，要防止战争十分困难。在一个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如何维持和平？但那次会议使我认识到，在战后的形势下人们需要联合国这样一个能够立即进行结构重建的保护伞式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十分重要。或许，联合国对伊拉

克战争很难产生影响，但在冲突结束之后的形势下，联合国是这个世界惟一处理这种情况的机构。

你们的这种使命感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们是否已经将精力放到其他缔造和平的领域？

戈德尔女士：我们正在一些难民营中从事体育方面的工作，我已经将部分精力放到这一和平运动上，为了那些青年而制定这一计划，因为我们必须使他们看到希望。看看现在的自杀率吧，战争、许多地方的环境恶化、犯罪和毒品等多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使许多年轻人感到绝望。到处都存在着青年人问题，如果他们没有希望，他们看不到困难后面的希望，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发生改变，于是便会感到绝望。我们既然将这些青年人带到这个世界，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不仅使他们感到有希望，还应该帮助他们实现希望，应该赋予他们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这是我们所从事的计划正在做的。

你们的青年计划为什么称为“根与芽计划”？

戈德尔女士：根的意思是拥有坚实的基础，而那些芽虽然幼小，但如果长在一起，在争取阳光滋润时，它们能够形成一堵墙，而这堵墙正是我们人类给这个星球带来的所有问题。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个人可以使事情发生变化。每个青年小组都可以选择三种项目——为人、为动物或为环境服务——而且这些事情都是手边的事。你可以逃避和做出不负责任的选择；而年轻人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应如何去做。这一计划已经在80个国家中全面展开。我们首先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发起，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力量很强大，在刚果和南非的组织也很强大，在肯尼亚的组织正在逐渐壮大，在喀麦隆的尝试也已经开始。我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非洲度过的。我们的一个计划被称为“小心”，这是为那些生活在原始森林周边地区的村民们设计的。因为如果你生活在令人厌恶的贫困环境中，那你就不可能存有拯救原始森林的愿望。这一点你们清楚，我也清楚。这一以非常神圣的方式教育村民如何自助的计划，在坦桑尼亚开展以来取得的效果相当不错。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这类的事，我们还将一些奖学金集中发放给那些有天赋的女孩，经营一些发放小额贷款的银行，帮助妇女利用小额贷款开始新的生活。

你们认为自己在将当地人同世界联系在一起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你们的经验是否使你们认为事情可以得到改进、或可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戈德尔女士：作为联合国和平大使，我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在那些国家旅行，帮助人们建立联系。我们将他们称为“理解的伙伴”，他们的工作是将年轻人召集在一起，赋予他们使命。在170多个国家中有一个被称为“环球青年行动网络”的组织，我们将这些青年联系到一起，使根芽计划扩展到全世

界各个角落，我们对这些青年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代言人。这些青年再通过他们的计划帮助我们，将目标进一步展开推进。我们只是为这种令人惊叹的联系提供动力，但将触角伸向那些缺乏阳光的黑暗角落是十分必要的。

卡塔尔迪女士：我工作的另一方面是鼓励媒体向那些被人们遗忘的黑暗的角落抛洒阳光。比如说，媒体已经将阿富汗遗忘。今天，当你走在阿富汗时，所有的人都在向你抱怨世人已经将他们遗忘。一天，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记者，但她来阿富汗只是为了报道大选的情况，大选一结束她便要离开。**阿里先生，你也到过阿富汗。阿富汗之行对你作为联合国和平大使的工作有何影响？**

阿里夫人：我想阿里先生认为，作为联合国和平大使，他曾前往阿富汗那样的地方。他是在战争结束后前往阿富汗的，目睹了战争给这个国家所带来的破坏。放眼望去，周围能看到的几乎都是废墟。我肯定，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那里的人民生活在废墟和尘土当中，如同卡塔尔迪女士所言，人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报道大选的情况，但在此之后呢？阿富汗人似乎遭到遗弃，我认为在许多国家，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健康和时间的原因，穆罕默德的旅行十分有限，但只要他去，就要带着目的前往、为那里的百姓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使那里的人民能够看到希望，而不是仅仅做些空洞的许诺。令人遗憾的是，现在那些空头支票太多。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今天，和平大使所发挥的作用比四年前更加重要，因为一切都在发展。或许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后院美国开始做起，将眼光放得稍近一些。因为尽管我们在国外做了许多工作，但我们还需要在美国做更多的工作，使得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之间能够更加互相容忍，共同生存，美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创建的。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卡塔尔迪女士：让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在非洲的根芽计划中，那些在外面上高中和大学的年轻人在回到村庄以后总是谈论学校中的见闻，儿童们特别喜欢听他们谈这些事。他们也谈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谈论当地那些连成年人都不能谈论的安全套和阴茎。他们谈论这些时，儿童们则嬉笑并不再倾听，但那些上些年纪的人则听得十分仔细，这种做法也可以使事情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正在同世界银行尝试进行合作，用大巴汽车将那些医务工作者送到乡村地区，向当地人讲解一些有关艾滋病的简单预防和处理方法。

卡塔尔迪女士：我记得1994年同奥黛丽·赫本一同前往索马里时，当地人不停地询问“奥黛丽是位演员吗？”许多当地人并不知道她非常著名，但奥黛丽还是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她走到哪里，人们都在呼喊“奥黛丽，奥黛丽，奥黛丽。”使当地所有的人都记住她的，并非是因为她著名，而是因为她为当地人民所做的一切。□

“一切与我们相关的事情， 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都毫无意义”

承认残疾人的权益



全球人口中，大约10%的人因大脑、身体和感觉神经方面受到损伤而成为残疾人。在这些残疾人中，接近80%的人居住在发展中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残疾人口的数量还在增加。人口的增长、医药卫生的进步使人们的生命得以延长、战争的伤害、地雷、艾滋病、营养不良、物质的滥用、事故和环境的破坏等诸多因素是造成世界残疾人口数量增加的根本原因。人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残疾人也应该享受到正常人所享受的政治、公

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所有的权利。身体的残疾和社会所设置的人为障碍限制了残疾人的生活，使他们经常享受不到那些必要的服务。这些限制不仅对残疾人和他们家人构成影响，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些地方，残疾人身上潜在的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

考虑到这些人致残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人类活动或缺少关怀所致，整个国际社会应该行动起来结束这种“无声的危机”。承认残疾人权利的过程虽然进展缓慢，但已经逐渐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开始。国际残疾人运动在其座右铭“一切与我们相关的事情，如果没有我们的参与，都毫无意义”的口号下发展壮大，这一口号包含了残疾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融合原则所发生的观念上的转变。12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纪念每年一度的国际伤残日活动仪式上强调：“如果没有那些残疾人作为正式成员参与决策，这个社会就不是建立在公正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

目前，世界对残疾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残疾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与个人相关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所代表的就是这种社会观点，这一分类将残疾定义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感受，而不是对社会少数群体的关怀；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丧失健康而感受到某种程度残疾的痛苦。这种对残疾概念老式的“医学模式”定义目前已经被“人权模式”所取代，人权模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因为社会对残疾人行使他们的人权所设置的种种障碍，才使得残疾人变成真正的“残疾”，要使人们对残疾的本质在观念上发生转变，并认识到对于任何人、任何社会来讲，残疾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则需要在观念上将残疾同人类的尊严联系在一起。

目前，在保护残疾人权利方面尚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条约，他们的权利只是被包括在现有的人权条约中。在联合国的八个核心条约之中，只有《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对保护

残疾儿童的权利做了详细的阐述。由于有关残疾人权利的声明和原则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许多残疾人权益活动人士认为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声明和原则只反映了社会在如何看待自己并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方面在方式上的转变。随着世界的老龄化，残疾人的数量预期还将增加，这一情况也突出了在这方面出台新条约的重要性。

2001年，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起草第一份旨在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公约的建议。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的起草准备工作。同联合国负责起草的其他公约一样，191个成员国都是这一公约的主要起草人。在获得这些国家的批准之后，这一公约将具有法律效力。由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大使路易斯·加里戈斯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最近已经完成了这一公约的第四稿，并将报告递交给联合国大会。

加里戈斯先生表示，目前他们在公约起草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是将其与人权公约框架结合在一起，并将残疾人的特别需要转变成公约的法律条款。他认为，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广泛的意见咨询，政府间在工作上的合作及征求残疾人组织的意见对于公约的起草工作能否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里戈斯强调指出，尽管这项工作十分复杂，但根据同各国政府所进行的谈判来看，这一公约有可能在2005年9月递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并通过。联合国大会正好将在这段时间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他表示：“如果错过这一时机，公约起草的进程将会失去动力，那将耗费我们更多的时间。”由特别委员会负责起草的公约的下一个版本将在2005年1月24日至2月4日之间完成。

一旦获得通过，《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草案将成为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框架文件。这一框架文件将确保残疾人“权利享有者”和“法律主体”的地位，他们将能够全面参与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的计划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这一公约还将促进人们对于“残疾”这一概念的理解，从而改变社会对残疾人的看法。□



对残疾人的歧视

残疾人通常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所享有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对残疾人的歧视通常表现为不同的方式。由于肢体的残疾和来自社会的障碍，他们的机会往往被剥夺，人身受到孤立和隔离。人们因残疾而遭受歧视的现象在教育、就业、住房、交通、文化生活、出入公共场所和享受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得尤为严重。这些歧视体现在区别、排斥、限制、选择和因残疾原因而拒绝向残疾人提供合适的住房等方面，严重剥夺或影响了残疾人获得承认、享受娱乐和应该享有的权利。

女性残疾人遭受歧视所产生的后果尤其严重。她们往往在因残疾而遭受歧视的同时还受到性别上的歧视。由于缺少关怀，她们还遭受一些形式的虐待，成为一些有害传统活动的受害者，妇女比男性更加蒙受成为残疾人的危险。她们比男性更难享受到教育、医疗和为就业而进行的康复治疗等方面的基础性服务。由于妇女在社区中被认为应该承担照顾残疾人的责任，她们的生活往往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取得一些进步，但残疾人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中并没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大多数有关残疾人的立法和政策的制定都以残疾人无法行使正常人所应该享受的同等权利这一假设为基础。结果，残疾人的状况往往仅仅被看作是解决康复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问题。社会应该为残疾人制定更加全面的立法以确保他们在各个方面能够享受到正常人所应该享受到的平等的权利。同时，社会还应该对目前存在的对残疾人的歧视现象采取适当的措施，并在社会生活和发展方面为残疾人在平等基础上的参与提供更多机会。

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存在的一些障碍也影响着残疾人对社会的全面参与。对他们歧视的一些做法，可能是因为一些已经被法律制度化的社会和文化标准所造成。改变对残疾人的看法和观念应当包括价值观的转变，并在社会各个层面加强对残疾人的理解两个方面，同时还应当清除一些社会和文化方面对残疾人不利的准则，因为正是这些准则，才使那些对残疾人构成不利影响的错误看法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一个人都能 参与的世界

为争取残疾
人的权益而
奋斗

维克多·潘达

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世
界将分享残疾人的意见和看
法，并为残疾人的文化增加新的
视野。



在我们这个世界，有6亿人——相当于世界人口的10%——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残疾。由于人口的老龄化和更多的人因受艾滋病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的数量在未来的岁月中还会急剧增加。出于这一原因，联合国负责宣传和公共信息事务的副秘书长长沙希·塔罗尔强调，《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的发展情况是世界应该更多了解的10个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为了直接应对这一挑战，一个名为“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的组织宣告成立。作为残疾人权利的热心支持者，我们不仅要为人权大声疾呼，还要分享那些已经争取到的法律条款并加以贯彻执行。

在大多数国家，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属在社会上往往被人们打上烙印，他们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经济上也处于劣势。《联合国全球残障计划》指出：“残疾问题一直被医疗和福利框架所掩盖，人们将残疾人看作是病人，认为他们同那些没有残疾的同胞不同，需要别人的照顾。由于只是强调残疾人在医疗方面的需要，相对来讲，他们更加广泛的社会需求则往往被忽视。”

我们认为，媒体同地方行动加以配合对于正在起草过程中的公约的贯彻落实十分重要。实际上，一个引起人们广泛争论的特写记录片正在制作当中。这一影片展示了5位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美地区残疾人代表的真实生活，让世人分享他们的世界。影片记录了他们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残疾人事业，以保证残疾人所享有的、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不再被剥夺的个人奋斗故事。这些人权包括生存

权、免遭非人性折磨和屈辱对待的权利、身体和心理完整的权利及自由、平等、结社、家庭／隐私等权利，以及承认残疾人在法律面前是一个完整的人，享有言论自由、选举及被选举、公民权和承认残疾人作为少数群体的权利。

任何新的人权文件，只有得到各种组织和政府承诺确保并实现这些权利的前提下才能生效。正因如此，我们和国际上的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一个人都能参与的世界”(AWE)这一组织，这是一个新型社会变革媒体项目，包括一整套为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与残疾人有关的人权文学和指导性材料的节目。“一个人都能参与的世界”不仅同残疾人进行实际接触，还认为残疾是全球性的人权问题。这一组织将世界上的数字化大众传播技术作为富有创意的工具，以迎接挑战，检验、反映并激发人民采取行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

关于媒体部分，维克多·潘达基金会已经同公共利益电视片总裁米歇尔·弗雷德合作，对电视节目进行开发，为主流媒体、记录片和公共服务通告提供节目。教育和外联工作则包括数字化世界残疾人课程、世界残疾人口述历史档案、讲座、专题讨论会、图书和出版物。人人都能参与世界的特别节目将以那些残疾事业活动家富有戏剧化和令人感兴趣的故事和口述历史故事为特色。这些节目还将包括对一些特别条款如保证残疾人参加体育、娱乐和消遣活动的第24项条款等的推动和贯彻。艾利斯·罗伊和杰西卡·安德森已经在创作有关这方面的第一个节目。他们所创作的独特的、富有创意的节目“准备出发”将通过文化性的特别体育训练节目，就



维克多·潘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谈残疾人能够做出的贡献及对当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认识。

人权、艾滋病等问题对残疾儿童进行教育。

在这些努力中，我们希望通过展示那些被赋予权利者的形象及同社会融合的真正意义等方式，制作出一批使人们从根本上用一种新的方式对独立的含义进行思考的节目。世界的能力必须被激活。不对残疾人的需求做出反应就是对今天伟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的漠视。

“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认为，残疾人问题就是国际人权问题。它向人们展示残疾社会在扩展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涉及到社会变革、社会存在的歧视现象和残疾人被社会接受、教育、就业等问题。这一计划的宗旨是为人们提供教育和信息，为人们观察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框架。作为残疾世界的一个社会样板，它将创造出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工具，被社会、教育和健康机构用来进行大众培训，并为那些从事人权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

“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组织最初由维克多·潘达所设想，他是在作为代表参加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对《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的起草工作时萌发这一想法的。这一想法在他作为获奖记录影片《古巴的残疾人》的制片人和导演以及去年夏天他到波黑旅行并在那里开始摄制影片《支离破碎的巴尔干半岛》时得到完善。2004年，他开始同30多年来一直从事制片人、导演和艺术教育家职业的弗雷德先生进行合作。

社会为将残疾人排除在外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美国国家残疾人理事会指出：“任何将残疾人排除在外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无法发挥其全部的潜力。如果残疾人不能够参与公共生活，任何社会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

维克多·圣地亚哥·潘达，获奖独立制片人，残疾人权益组织维克多·潘达基金会主席。他曾同世界银行及联合国机构及多国政策制定者及国家领导人进行合作，为促进残疾人获得公平机会、机遇和被社会所接纳而努力。



促进残疾人的权利

联合国从其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提高残疾人的地位并改善他们的生活。联合国对残疾人的权利及福利的关注植根于其成立时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以人权、基本自由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及相关的文件确认，残疾人同正常人一样，有行使自己公民、政治、社会及文化权的权利。

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联合国通过其派出的顾问小组和技术人员培训班及建立康复中心等方式，在预防残疾和使残疾人恢复正常生活方面为一些国家的政府提供了帮助。

在上个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起扩大残疾人人权概念运动，为他们争取更加平等的机会。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智力迟钝者权利宣言》，规定智力迟钝者享有同他人一样的权利。宣言还根据残疾人医疗、教育和社会等方面需要，规定了他们所享有的特殊权利。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宣言》。这一宣言为残疾人享受平等待遇和得到社会服务以帮助他们进行能力开发、促进他们融入社会规定了标准。

对残疾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康复及预防残疾等予以特别强调的《世界行动计划》于1982年12月3日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这一天后来成为国际伤残日。

在1983—1992年联合国国际残疾人10年活动期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是，《身心障碍者机会均等之标准规范》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这一规定现在已经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最近召开的一些联合国国际会议也将残疾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并对以往的一些歧视残疾人的做法提出了纠正建议，以促进残疾人作为各自国家的公民全面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的权利。目前，残疾人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对新技术的获得、特别是获得信息通讯技术的渠道，及在社会和经济等广泛领域提出政策性建议时，将残疾人利益包括在内。

参与权和获胜权

国际残疾人奥运会



艾米·法卡斯

20

04年9月17日，来自136个国家的3837名运动员在希腊雅典参加了第12届国际残疾人奥运会。

这是除奥运会之外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事。残奥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伤残运动员提供了参加奥运水平体育竞赛的机会。同一天，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G)与国际康复总会(RI)联合举办第一届国际残奥会伤残人权研讨会。举行这一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对正在起草的《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表示支持，这一公约旨在保护包括残疾人运动员在内的所有残疾人的人权及其他权利。这些残疾人的权利包括娱乐权、参加体育运动和休闲的权利、全面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等，但公约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权利。对残疾人和为残疾人服务的机构进行教育，使他们带动所在的社区支持联合国残疾人公约也是十分重要的。

残奥会会场自然被选择成为国际残奥会向正在起草之中的联合国公约表示支持的场地。如同联合国秘书长解释的那样：“残奥会充分展示了残疾人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活力。”运动员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使世界感到激动和鼓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体育能够使人发生变化的观念，因为体育是世界共同的语言，残奥会为人们团结起来提供了机会。9月，国际伤残人奥林

匹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人权方面的原则声明。这一声明重申了他们的核心信念，人人都应有享受消闲、娱乐和体育活动机会的权利。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认为，如同人人都应享有人权那样，每个人也应该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

尽管残疾人的状况在一些国家得到了改善，但目前残疾人所面临的事是，没有一个国际性的关于残疾人的人权公约，这些社会成员的权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作为世界最大的少数群体，残疾人在权利上并没有像其他少数民族那样得到保障，他们仍在遭到各种形式的歧视。一项旨在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公约将在全世界产生效力，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加强人权活动的力量。

就体育和娱乐方面来讲，残疾人应该同所有人一样，享有参加各种水平的体育运动及娱乐活动，组织和参加体育活动，得到必要的指导、训练和资源并能享受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的权利。此外，青少年残疾人在体育、娱乐和休闲方面也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包括在那些教育系统内所提供的活动。他们也应该享受游戏的权利。但除了那些明显的权利之外，许多残疾公民实际上仍然无法享受许多权利。

国际人权法还承认，人人有休息、享有闲暇时间及参

加娱乐活动和体育运动的权利。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体育教育事务部长及高级官员国际会议也确认了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和享受体育教育的权利。负责监督《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条约监督机构在其总注释第5条关于残疾人的说明中也承认，这些广泛权利的相关内容也适用于那些残疾人。这些内容将残疾人的权利扩展到参加旅行及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娱乐活动。《联合国标准规范》第11条关于残疾人享受平等机会的权利规定，成员国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残疾人在娱乐和体育运动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通过对全球社会进行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残疾人毫无疑问仍在面临着歧视，这种歧视有时体现为完全拒绝残疾人参加一些休闲活动——包括参加或欣赏体育竞技项目——的方式。即使在那些允许残疾人参加的公开活动中，残疾人也会因为身体的原因、难以承受的费用、所提供的不平等服务和计划，或在残疾人融合

方面质量低下而受到限制。那些对如何在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中将残疾人包括在内的做法不理解和缺乏认识的现象，也将残疾人排斥在外，结果使得残疾人的参与被低估或漠视。正因如此，联合国正在起草的公约将这一特别应用于残疾人的权利包括在其条款之内是十分重要的。

残疾人的体育娱乐活动还事关他们的康复及教育。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在于康复。1944年，鲁德维格·格特曼博士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在斯托克·曼迪维尔医院开办了一个脊柱损伤治疗中心。该中心将体育运动引入，作为对残疾患者进行治疗并使他们得到完全康复的主要手段。这种康复性体育运动很快就进化成为娱乐性体育，并在几年之内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成为竞技性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帮助许多康复计划实现了其目标。用约旦王子拉阿德·本·扎伊德的话说：“体育已经被证明是残疾人早期康复阶段价值无法估量的战车，并在他们与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残疾人来讲，全面和早期主动性的康复方式十分关键，其中包括给予他们参加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的机会。

认识到体育和娱乐活动在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对于残疾人来说，他们体魄的强健、自我决定和能力等，往往只有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些能力能够使他们克服身体的障碍，在一些领域达到优秀的水平。一位残奥会运动员表示，“通过参加体育

运动，现在我体魄强健、灵活，操纵轮椅的技术娴熟。这些使我能够在就读的医学院具有竞争力，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要求我必须拥有强健的身体。”

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坚定地认为，残疾人有参加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的权利。如同在其原则声明中所强调的那样，委员会同意继续推动其人权哲学，并通过残奥会及其他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认可的体育活动来实现其政策。从根本上讲，这一目标通常通过其成员国及同

“如果我要成为马拉松世界冠军，我将全力以赴进行那些能够使我成为世界级运动员的训练，以那种方式生活。这样，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就不会缺少机会。如果我要在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进行每次26英里的马拉松长跑训练，我就不会被横在我训练道路上的一道道越来越艰难的障碍所吓倒。不仅如此，我还要骄傲地宣布，我是一个轮椅上的马拉松运动员，从事业上讲，我有成为残奥会美国队成员的潜力。这就是人权。”

——切里·布劳维特，2000年和2004年残奥会美国运动员

国家、地区、体育组织及代表残疾人组织的合作来实现。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对夏季、冬季残奥会和其他竞技项目进行监督和协调，最重要的是那些世界及地区性的锦标赛。总部设在德国波恩的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还对通过各种水平的比赛在世界范围选拔和开发运动员提供支持。□

如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参阅由国际康复总会和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开发的“残疾人休闲、运动和娱乐的权利”一文。此文在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网页工具栏中可以找到 (www.paralympic.org)。本文由国际康复总会及美国东北大学社会体育中心提供。

艾米·法卡斯，自2003年以来任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开发部经理，该部门负责国际伤残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维持工作。在此之前，她曾任越战老兵美国基金会科索沃生命运动计划项目经理，美国体育运动和伤残问题国家中心信息专家。





主权负有保护人权的责任

瓦塞林·波波夫斯基



国际法有两个主要的价值观——老观念是尊重国家的主权，更现代的观念则是尊重人权——这种价值观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并为其所接受。但这两种价值观共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对于这两个原则来讲，二者之间发生的冲突多于合作。本文支持国际法那种更现代的观念，即国际法包括保护人权的责任。

许多世纪以来，国际主权原则在国际法中被认为是压倒一切的和无条件的。国家出重拳打击那些试图限制国家主权的任何尝试，甚至不允许对其绝对性提出任何疑问。在这方面，1919年制定的《凡尔赛条约》就是一个例子。该条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并确认包括德国皇帝凯撒·威廉二世在内的犯有战争罪的战犯，并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审判。然而，战胜国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在国际法庭上对这些国家首脑进行审判在“各国法律和国际法上从无先例，因而与国家主权的根本观念相悖”¹。实际上，这些战胜国的领导人担心，这种先例一开，将来也会轮到他们自己。因为同样的政治原因，试图起诉对1915年美国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的努力也遭到失败。当希特勒公布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屠杀计划时，有人听他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有谁还能记得那些美国人？”²这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令人发指的戕害人类罪行的人进行赦免的做法最终导致一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更加严重的罪恶。